

広き富士の裾野で育まれた『竹取物語』

— 「かぐや姫」の伝承世界—

百田 弥栄子*

はじめに

東京神田の三弥井書店は 2011 年より伝承文学比較叢書として『鉄文化を拓く 炭焼長者』『鷹と鍛冶文化を拓く 百合若大臣』等、続々刊行している。その趣旨は

……わたくしどもは、たまたま他民族の文化にふれるとき、日本のそれとの違いは勿論、その同質的はものに驚きを感じず。……「伝承文学比較叢書」はこのような実感をもとに、伝承文学研究の深化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本の伝承文学を民族を超えた広がりの中なかで考究し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が、その基軸を日本民族におきながら、他民族、特に近隣の諸民族のそれとの比較において試みるものであり、当然、それぞれの諸民族の研究者との共同の中なかでその達成をはかるものである。すなわちそのような方法において、伝承文学の研究の普遍化を志すものである。

多くの研究者の賛同を得て、その研究が進展することを強く望むものである。と謳う。このシリーズは京都の立命館大学名誉教授の福田晃先生のご発案ご指導によって進行した。日中韓の研究者が集う東アジア歴史文化研究所の趣旨とも、うるわしく共鳴していよう。

そして福田先生は「こんど『竹取物語』をやりましょうね」とおっしゃった。今にして思えば、先生はすでに『竹取物語』の原風景をはっきり描いておられ、その心積もりがあつてのお誘いだった。

2012 年 10 月 28 日 伝承文学研究会が京都駅近のキャンパスプラザで開催され、福田先生が「富士山縁起の伝承世界—竹取説話をめぐって—」なる講演をされた。次いで 12 月 2 日富士宮市文化会館で「富士山縁起と放鷹文化」なるご講演を。翌 13 年 4 月 21 日、京都キャンパスプラザで「富士山縁起諸本解題」を。続いて 5 月 26 日、新富士にて「富士山縁起を歩く」。いずれも B3 版数枚から 18 枚のペーパーに大量の資料を掲げてのご講演である。加えて藤枝市、松代市、浜松城、富士宮市等で、諏訪流放鷹術

* 東アジア歴史文化研究所 教授

大阪外国語学校における初の蒙古語教師^{ハンフトムジンガー}韓穆精阿について

横 田 素 子*

はじめに

小論は、旧制官立専門学校であった大阪外国語学校（旧大阪外国語大学）¹における傭外国人として初の蒙古語教師となった「韓穆精阿」についての検証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彼を認識した切欠は、拙稿「1922年蒙古同好会設立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其の1〉」²を発表するに先立ち行った資料調査においてであった。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蔵「戦前期外務省記録」に、「蒙古同好会」設立発会式に参列し、講演を行った「外国語教師オンボーバトマー」³なる者の名を確認し、彼が大正11年度(1922)から13年度(1923)までの3年間、東京外国語学校（現東京外国語大学）の「外国教師」⁴として蒙古語を担当していた「ゴンボ・パトマジツプン **Gonbo Badmajapuft**」⁵であると同定したのだが、その前任者が将に小論主題に掲げる「韓穆精阿」であったのだ。然も彼がゴンボ・パドマジツプンの在任年数をはるかに凌駕する10年に亘る任期を勤めあげた記録を目の当たりにし、少なからぬ興味を抱くこととなり、先の拙稿執筆と並行して韓穆精阿に関し調査を進め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ある。

また、拙論における論題を最初の赴任先である東京外国語学校ではなく、大阪外国語学校とした理由は、该校における初の蒙古語教師となったことに他ならない。東京外国語学校においては韓穆精阿の前任に「羅ト藏全丹」が存在した。その任期は明治42年(1909)年度から明治44年度末(1911)までの3か年であったが、東京外国語学校における初の外国人蒙古語教師は羅ト藏全丹であった。そういった意味で彼もまた大いに興味をそそられる人物であるが、羅ト藏全丹に関する研究は次の機会までの案件とする。今回は韓穆精阿を主軸に据え、該題に掲げた「大阪外国語学校」のみに拘泥することなく考察をする所存である。

その方法として、第1節では、韓穆精阿の蒙古語教師としての業績について当該校刊行書籍から検証するものである。

続いて第2節では、公文書から韓穆精阿に関する事象について時系列に探っていく

* 東アジア歴史文化研究所 教授・内蒙古大学 客員教授

[Source Material]

An extremely precious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document

——Introduction to “SHANG TU THE SUMMER CAPITAL OF
THE YÜAN DYNASTY IN DOLON NOR, MONGOLIA”

ZHOU Taiping*

In July 1937, a research team organized by the Japanese East A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THE TOA-KOKO-GAKUKWAI went to the Doloon Nuur area of Inner Mongolia to conduct on-site inspections of the Yuan Dynasty capital site. That is, for the first time, modern archaeological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conduct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Yuan Shang-tu (Xanadu) site in the Yuan capital.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ite of Shang-tu,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carried on mainly by the Archaeological Laboratory in the Faculty of Letters of Tokyo University.

The Team which proceeded to this ancient site for research purposes consisted of the following persons: Yoshito Harada原田淑人 and Kazuchika Komai駒井和愛, besides Tomoo Kobayashi小林知生, of the above-mentioned Laboratory; Eizo Akabori赤堀英三 of th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Room in the Faculty of Science of Tokyo University; Masao Suyenaga末永雅雄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oom of Kyoto University; Haruo Noda野田春男 of the Railway Bureau of Chin-hsien/錦縣 by the courtesy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and the Railway Bureau of the Manchoukuo government, who took upon himself the task of surveying; Kozaburo Shimamura島村孝三郎,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Far-Easter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who looked after the financial end an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Chikaharu Yoshimura吉村親春, who was sent by the Social Section of the Minseibu Department of the Manchoukuo government to help as an interpreter.

The team made its headquarters in a Mongolian house (ger) erected near an abandoned Lama temple of recent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site of the Inner City of Shang-tu. Guarded by eleven Mongolian soldiers, they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during the week beginning on the 14th and ending on the 20th of July, 1937. First examined the inner and outer walls of the city and ascertained the whereabouts of the gates. Then proceeded to take notes on the outlines of buildings, beginning with that of the Imperial Palace buildings near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wall of the Inner City (Forbidden City), and also examined the Imperial Garden which extended beyond the walls of the Outer City (Imperial City). They toured the ruins of a temple near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Outer City. There, they found the turtle-shaped base of a stele lying in the grass. In addition, discovered what may be taken to be the site of another tem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教授・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善邻协会在厚和·包头的文化侵略活动

——对回民的怀柔政策

娜仁格日勒*

白红梅**

序言

关于善邻协会及其在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侵略活动，拙文《日本善邻协会在内蒙古活动的记忆》¹已有较详细的阐述。另一篇《日本统治时期在内蒙古进行侵略活动的人物前川坦吉》²对于善邻协会的重要人物前川坦吉进行了详实的考察。本文也是笔者关于善邻协会的系列论文之一，着重论述善邻协会在厚和（现在的呼和浩特）以及包头进行的针对回民的怀柔拉拢等文化侵略活动，从这一视角分析该组织在这些地区所进行的侵略活动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揭露其本质。

善邻协会对厚和以及包头地区的回民的拉拢怀柔工作，主要体现在“回教圈考究所”、“回民诊疗所”以及“善邻回民女塾”等方面。

一、回教圈考究所的经营

前面业已提到，关于善邻协会的概况已有拙文刊载在相关刊物上。因此直入主题，梳理善邻协会经营“回教圈考究所”的具体过程，揭示善邻协会的文化侵略。

根据善邻协会成员的回忆录《善邻协会史——在内蒙古的文化活动》（以下简称《善邻协会史》）记载，1938年1月，大久保幸次与小林元等人在东京芝白金三光町建立了“回教圈考究所”³，大久保幸次任所长。其实，善邻协会早在建立初期的1935年就已经关注回民等伊斯兰教地区，并于1935年11月出版了《蒙古与新疆》。

1938年2月，根据驻蒙军的指令，善邻协会理事长井上璞与总务部长野副金次郎以及音尾秀夫等人在张家口特别市隆昌巷2号成立“在外本部”，废除“新京”事务所，将东京本部完全委托给大岛丰常任理事。在此期间，基于野副金次郎的提议，善邻协会更明确的将汉族和回族也加入“比邻诸民族”之中，即对汉族和回族也展开进一步的拉拢工作。⁴

同时，善邻协会1938年2月的相关规定中明确指出，“在开展对回教文化工作时，须接受驻蒙军队的指示。”⁵在驻蒙军的指示下，善邻协会进一步加强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回族人民的渗透。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讲师

13 世纪及其以前蒙古人何时过新年续考（下）

——兼谈道尔吉·班札罗夫的说法及其所谓根据

阿尔丁夫*

六、阴历三月十六～四月十五，相当于古代蒙古物候历 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类似阴历“腊月”的证据

孟夏四月十六日是蒙古草原“天气变暖、青草复生”的日子，是古代蒙古物候历春之首月首日，也即新年，相当于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的前一天晚上相当于中原民族所说的“除夕夜”。“蒙古人把除夕叫做‘毕图’或‘毕顿’，是封闭、完整之意。除夕是一年的终结，是给年划上了句号之日”。¹除夕夜所在的月份（3.16～4.15）类似于古代蒙古物候历的“腊月”。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蒙古族祭祀》一书，在谈到“祭祀礼仪”之中的“大祭（年祭）”时写道：

腊月被称为呼贺（布谷鸟）月、冬末月、沃勒津月等。²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腊月被称为布谷鸟月、冬末月”问题。显而易见，这里的“腊月”不可能是指阴历腊月。要知道，即便是“华北、华东”地区，要想见到布谷鸟并听到它们的鸣声也须等到“暮春（阴历三月）、初夏（阴历四月）”。³在蒙古草原上，而且是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阴历腊月，怎么可能见到布谷鸟听到布谷鸟的鸣声并将该月称为“布谷鸟月”呢？在排除了“腊月被称为布谷鸟月”中的“腊月”是阴历腊月之后，那么，这里的腊月指的就只能是古代蒙古人以草青一次为一年的新年前的那个月，也就是从阴历三月十六日到四月十五日这个“腊月”，也就是“冬末月”了。在这个“腊月”里，实际上相当于阴历的暮春和初夏，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布谷鸟，听到它们的鸣声从而将该腊月称为“布谷鸟月”，不正好证明古代蒙古人的物候历新年是在暮春的阴历三月下半月和初夏四月上半月（3.16～4.15）之后那个月（4.16～5.15）的首日即阴历四月十六日么？！

第二个问题是“腊月被称为……沃勒津月”问题。这里的“沃勒津月”是几月呢？从《白史》一书中有“春末月沃勒津辰月二十一”记载来看，“沃勒津”前有“春末”二字，后有“辰月”二字，据此可知，作为“腊月”的“沃勒津月”便是包括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在内这一天。这个日子所在的月份恰好是指古代蒙古物候历新年之前那个月，即从阴历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期间的“腊月”。这同样证明古代蒙古人的物候历新年确实是在阴历“孟夏月十六日”即阴历四月十六日。

*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羽田亨千佛洞研究汉译文本的应用

白 莉 莉*

摘要

历史文献的翻译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相关历史研究领域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历史文献的翻译不仅丰富相关历史研究成果的文献支撑，更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思想信息交流与互鉴的过程。因此历史文献汉译文本的应用研究，对促进国际历史研究及文化思想的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发展不可或缺的跨学科研究。本文应用羽田亨敦煌千佛洞始建年号、始建人物、扩建人物的系列研究中的部分汉译文本信息，分析探讨近代日本敦煌学研究在国际敦煌学研究领域中的潜在价值。

关键词 羽田亨，千佛洞研究，汉译文本，应用研究

序论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文书的出世，掀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热，以至于敦煌学一度成为法国中亚学、日本东洋学的代名词¹。由于古文书大部分被中亚探险队运输到法国和英国，有一部分被运送到北京，日本敦煌学的起始时间稍晚于其他国家，但以京都大学史学会为代表的日本学术界后期发表出版了不少敦煌古文书的研究成果²。

近年国内有关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主要围绕莫高窟雕像与壁画，从艺术的角度关注者居多，历史文献学视角的研究相对少见。本文基于对羽田亨敦煌莫高窟，即千佛洞的始建年号、始建人物、扩建人物等系列研究的汉译及对部分文本的引用，分析国内敦煌学研究领域对羽田研究成果的应用概况，探讨羽田为代表的近代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及其在该领域中的应用及其潜在价值。时至今日，敦煌学研究各方都已产生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日文史料的挖掘将进一步深化敦煌学历史研究，并促进敦煌学国际学术交流。

1. 羽田亨的千佛洞研究背景

敦煌莫高窟地处甘肃省敦煌市境内，也叫千佛洞（西千佛洞），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其营造过程、悠久的历史及巨量的藏品而著称，也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更有“东方卢浮宫”

*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历史文献翻译与应用研究、地域文化外译研究。

试析都市餐饮场域中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再生产（一）

——基于呼和浩特市蒙餐店的实地考察

秀 丽*

摘要：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是一种生长于草原牧区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其中饱含蒙古族先民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与生存智慧，是蒙古族草原牧民适应特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集中体现。都市化背景下，蒙餐业的发展为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契机。在都市餐饮场域，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因其独特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传统而备受关注，同时其市场价值也得到重新评估和挖掘，并被人为地从原有的生存场域剥离出来，经过商业开发与文化包装后走向都市舞台，发展为全新的蒙餐文化。本研究基于笔者近年来在呼和浩特市蒙餐店展开的多次实地考察活动，立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视野，探究都市餐饮场域中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再生产，旨在展现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在都市餐饮场域中的传承与再造的基本样貌。出于篇幅考量，本研究将分成两篇文章进行撰写。其中第一篇，即本文主要围绕蒙古族传统饮食种类和特征，参与并推动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主体及再生产的方式等内容展开阐述，并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其进行理论阐释；第二篇则基于第一篇研究的基础上，就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再生产之价值与意义、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展望等内容展开延伸思考与讨论。

关键词：餐饮场域；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再生产；蒙餐店

一. 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概述

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是一种生长于草原牧区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其中饱含蒙古族先民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与生存智慧，是蒙古族草原牧民适应特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集中体现。作为长期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主要分布于蒙古高原地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此外，蒙古族在俄罗斯等欧亚国家也有分布。为适应蒙古高原独特的生存环境，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经营模式。他们不擅长耕稼，以肉、奶为主要食物来源。在蒙古族的肉食传统中，牛羊肉的占比向来占据较大比重。蒙古人兼食驼肉，但由于骆驼只分布于蒙古草原的戈壁地区，食用驼肉的现象远不及牛羊肉那么普遍。蒙古人较少食用马肉，因为马是蒙古族赖以生存

* 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呼和浩特 010000

明代日僧入滇的事迹

A review of The Japanese Monks in Yunna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何大勇*

【摘要】明初由于受到宰相胡惟庸“叛逆”案的影响，来自日本的入明僧被谪徙各地，云南是其中之一。学者们围绕来滇日僧展开了考证。本稿依据中日文史料及研究成果对来云南昆明的日本僧人进行整理，根据史料记载，时间从明初来滇到昆的日僧有此宗昙演（演此宗、昙演）、柏岩、宗戒、斗南、天祥、机先、立恒中、大用等，还有存疑的宗泐、石隐、镜中照等。日僧谪滇，留存下了多主题的诗文题咏，这些汉诗成为文学、史者的研究课题。同时，作为遗存物有称为在大理的实证物日本四僧塔。而在昆明的遗存物，在圆通寺内的碑文中，可以考证出一些留滇痕迹。

关键词：入明日本僧 云南 事迹

引言

关于来滇入明日僧的研究，多以论述汉诗的内容，而对于日僧的情况却语焉不详，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文献中有相互矛盾的记述，有的日僧情况则是缺乏关键性的记述。作为明代日本僧人圆寂于大理的实证遗存物，有称为日本四僧塔的合葬墓塔，位于今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城公园内，2006年得到修葺，2012年1月7日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圆寂僧人的具体名存在争议，未有记述。四僧塔旁边立有《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修缮日本四僧塔碑记》和《大理日本四僧塔铭》，《塔碑记》中也未明确具体的四僧名字，在《塔碑记》载：“明朝洪武年间，日本国僧人逐光古、斗南、机先、天祥等云游到云南大理，学禅吟诗客居叶榆，留下了一段佛教文化交流的佳话。”仅仅是列出来榆有代表性的僧人名，同时也有暗示埋葬人物之意。

作为汉诗资料，由明沐昂（1379-1445）编《沧海遗珠·卷4》中载有日僧诗作30首诗作，分别为斗南18首、天祥11首、大用1首。其它明人的诗句中则是出现了一些疑似日僧的名字，如宗泐、镜中照等。《沧海遗珠》所收日僧的诗作，成为考证日本僧人明初来滇的重要史料。

留昆日僧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作为问题，各学者由于所掌资料的不同，进行了深浅不一的探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未能说清楚。本文将对以往研究

* 中国云南民族大学研究员·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东亚人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